

这个社会，谁在不满？

杨光斌



到底是哪些人对当下不满呢？恰恰是那些生活已经得到一些改善的城市居民。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这种不满意似乎是可控的，即规模有限。即便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需要找到人们不满意的根源并进行针对性改革。

改革是为了回应人们的不满，解决人们的痛苦，为此就需要找到哪些人不满、为什么不满，这样，改革才能精准发力。但是，人的天性是拿着放大镜看自己国家的问题，用望远镜看别国的问题，从而导致人们的认识与真问题偏离，甚至形成错觉。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怀特根据其长期的田野调查得出结论：中国的许多问题要么被夸大，要么不真实，而无论是被夸大的问题还是伪问题，都是因为人们仅凭直觉而非调查研究，从而得出似是而非的看法。

比如，在当下中国，哪些人最不满意？一般的看法是，既然有这么多的群体性事件，而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是下层民众，即农民和下岗工人，那不满的群体必然是下层民众。但是，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的调查结论是，发生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因为工作程序上出了问题，侵害了民众的利益，而一旦得到补偿，社会弱势群体就会接受和安于现状；不仅如此，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的报告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恰恰是因为社会弱势群体对制度性现状的接受，政治稳定才得以保持，因此群体性事件并不意味着它是政治不稳定的“社会火山口”。

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对当下不满呢？恰恰是那些生活已经得到一些改善的城市居民。虽然城市居民的生活改善水平比农民更快也更高，但他们也受到失业、社会保障不足、高房价、收入下降等问题的困扰。更重要的是，满意不满意，还是一个主观感受问题。作为城市居民，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农民优越，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显然超过农民，他们对现实中不公正现象的感受比农民更强烈。比如，他们对腐败的恶感远远超过农民，他们对单位用人制度的不公正感受也超过个体化生存的农民。再则，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他们习惯于拿世界上的高标准来对照自己的境况，不满

之情随之放大。

这就是和一般印象大相径庭的事实，即对现实不满者非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而是既得利益者的城市居民。这也符合亨廷顿在其经典著作《社会变迁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言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容易产生不满情绪的群体来自城市居民。在亨廷顿看来，城市居民的不满并没有农民阶级的不满那么可怕，城市的不满可能招致政治动荡，而农村的大规模不满则会危及政权。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但是，在信息化，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城市居民大规模不满的结果同样也会危及政权，从“第三波民主化”到“阿拉伯之春”，很多国家的政治转型都是城市居民不满的产物。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这种城市居民的不满似乎是可控的，即规模有限。国内、国际不同民意机构的若干次民意测评一致结论是，80%以上的中国百姓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这对那些凭直觉看中国问题的人是一个重要提醒。即便如此，对一部分城市居民的不满也不能掉以轻心，需要找到人们不满意的根源并进行针对性改革。

首先，不满来自民生的困扰，需要以改革促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这类人口十几亿的超大型国家，大都市居民对房价问题的不满是永恒的，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无能为力。但是，在社会保障、失业、收入等民生问题上，政府可做的则很多，比如提高居民在第一次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即提高工资收入，在第二次财富再分配中增加社会保障的份额，以让老百姓更安全更体面的生活，以简政放权去改善营商环境，以减少失业带来的压力并增加收入，等等。客观地说，在改善民生问题上，中国政府的能力远比

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强，当然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其次，不满来自对不公正的宏观环境的感受，需要以反腐促公正。在过去数年里，腐败几乎成为一种结构性文化，为此每个居民乃至公务员办任何事都得求人，形成了人人求人、人人被求的恶性循环，由此而酿成的生活成本、生存成本难以计量，社会颓势心理由此产生。为此，强力反腐势在必行。反腐以正吏治，吏治正则民心正。强力反腐只是治标，反腐为治本开道，减少建立治本制度的政治阻力。同时，治本还需要减少国家占有资源的比例。在过去十几年里，政府之手无处不在，占有不成比例的资源，腐败丛生是必然的后果。因此，治理腐败之本不但是防止腐败的制度建设，更应该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减少国家垄断的资源。资源少了，官的权力自然没有那么大了，腐败的几率自然就少了，腐败的数字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再次，不满还来自微观环境。比如基层单位用人体制的不公正，需要以“微民主”促公正。很多城市居民依然生活在基层单位体制之中，而基层单位中的最大问题是用人体制，单位中人事制度上的不公正必然被放大到体制甚至制度，被认为是体制问题才导致单位中的问题，对体制的很多不满因此而来。为此，需要“微民主”即在基层单位中实行选举民主，来化解人们的不公正感，大家都彼此了解，好坏都是自己选的，自己对自己负责。基层单位的选举虽然不能带来多少快乐，但至少可以减轻不满感，全社会的负荷必将减轻。中国搞不了西式“大民主”，基层单位中的“微民主”则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人们的很多不满主要来自生活体验，来自民生困扰。而人们满意或不满，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齐鲁晚报

B02

思无邪

编辑：张文 美编：石岩 组版：刘燕
2014年9月7日 星期日

沉闷的思想界出不了大师

朱清时



做人要有自己的思想。至少一个人的一生中要体会一下这种伟大。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别出心裁的新思想。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是大家不断想出新鲜的主意，而且大家都包容和鼓励这些新想法。沉闷的思想界是出不了大师的。

2005年，钱学森对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国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指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重大问题：国家和学生都为教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到头来却发现学生没学到多少真本事，创新能力不足！

什么是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呢？认真研究人类社会中最有创新能力的人群，我们可以发现，创新型人才有一些共同点：他们拥有极强的自学能力，不局限于标准学校教育；他们博闻强识，不只专注一个领域；他们在面对怀疑和反对时，通常坚持己见；他们能产生很多点子，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敏锐地判断出哪些点子值得深思下去，并付诸行动。

为什么我们的高校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原因很复杂，大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以下几点可能是大家都会同意的。

一是我国的大学高度“同质化”。所有大学都用同一模式建设（教育部有一个标准的高校设置条例），都想成为研究性大学；本来很有特色的学院都升格为综合性大学；所有大学的专业设置都类似（教育部还颁布有标准“目录”）；每个学校同一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教材都很相似。这样一来，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成为高教流水线上的产品，知识结构趋同，长处和短处都一样，这样的学生还怎能“标新立异”呢？

相比之下，美国的高等院校结构如下：41%是二年制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20%是大学专科；18%是只授学士学位的普通大学；15%是只授硕士学位的普通大学；6%是可以授博士学位的大学，这其中约一半（3%）是研究型大学。美国的教育部很弱势，大学自主权很大，大学之间的竞争很强。每所大学为了在竞争中生存，都争相在新专业设置上别出心裁，每个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教材也都突出特色，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就多种多样。

二是灌输式教育。爱因斯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创新能力的科学家，他在1955年3月（他去世前一个月）这样回忆他

在1896-1900年在苏黎世工业大学的学生生活：“我很快发现，我能成为一个有中等成绩的学生也就该心满意足了。要做一个好学生，必须有能力去很轻快地理解所学习的东西；要心甘情愿地把精力完全集中于人们所教给你的那些东西上；要遵守纪律，把课堂上讲解的东西记下来，然后自觉地做好作业。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一切特征正是我最为欠缺的。”“对于像我这样爱好沉思的人来说，大学教育并不总是有益的。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和肚子搞坏的。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会渐渐地熄灭。”

爱因斯坦的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灌输式教育的弊病，目前它们仍然在我国教育体制中普遍存在。

我们的灌输式教育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国际上先进的大学早已把它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即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选专业，自选课程，只要学分够了即可毕业。这样做很难保证知识的连贯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使得学习可能是跳跃式或跨越式的。但它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特别是自学能力。

三是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还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如应试教育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过早分专业使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不能适应学科交叉的问题；本科实验课严重衰竭，使学生缺乏动手能力，难以把想法付诸实践，等等，不一而足。

我国的教育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多种多样的实验。南科大立志成为我国高教改革的一所实验学校。我们教改的核心是探索如何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针对上述问题，南科大实行了一系列的教改措施：在招生方法上，我们采用“6+3+1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自主招生能力测试成绩占30%平时成绩占10%的综合评价模式），其中自主招生能力测试考察学生的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和注意力，以挑选出创新素质好的学生；在学制上，学生入学头两年不分专业，上统一的基础课，后两年自选专业，以增强学生适应交叉学科的能力。实行学分制，可提前或延后毕业；在教学内容上，我们强化本

科实验课，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精干的必修课基础上，增多选修课，使学生有个性的知识结构；在教学方法上，让本科生参加教师的科研工作，通过研究来学习，使学生不仅获得多学科的知识，而且可以综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此外还有部分课程全英语教学；书院式学生管理等。

五年的时间很短，但以上措施已经取得较好成效。南科大已初步形成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开创精神的特点。第一届教改实验班学生半年后将毕业，他们中有近半数同学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获得金奖和银奖；李荣蓬同学在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中获一等奖；张文超同学在国际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周牧兵同学在全国高校大学生金融期货及衍生品知识竞赛中获特等奖；通晓同学与教师合作的论文已被英国自然杂志的子刊录用。有两位同学（王嘉乐和何明浩）提前毕业，他们已分别被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录取为研究生。这些事实说明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学生已开始崭露头角，受到社会欢迎。

然而，这几年南科大教改也使我们感到，光靠大学进行教育改革是不够的，教改更重要的是管理体制变革。管理体制多样化才能产生教育的多样化。大学必须有真正的自主权，才可能办出真正的特色。

要培养出钱老所说的大师级的创新人才，还有更深层次的要求。帕斯卡尔说过一段话，思想使人伟大。人生就像芦苇一样，很脆弱，但人是有思想的芦苇。这就是说，做人要有自己的思想。至少一个人的一生中要体会一下做人的这种伟大。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别出心裁的新思想。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是大家不断想出新鲜的主意，而且大家都包容和鼓励这些新想法。沉闷的思想界是出不了大师的。每个学生都应把追求新思想提高到人生意义的高度来认识，全社会都要有真正“百花齐放”的氛围，我们的大学才能成批涌现出大师级人才。

(作者为南方科技大学原校长)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

名家杂说